

国际竞争与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

陈飞翔

当今世界日趋开放,各国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具有国际性的意义。一方面,任何一国想要有效地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会直接地制约一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每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构。因此,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步骤,已经成为各国应当也是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亟待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及早启动和促进我国比较优势模式的转换,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和必然选择。

一、实现经济起飞必须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过去15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效令世人瞩目,已经步入了期待已久的现代经济成长起飞阶段。然而,我们能否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则仍有许多重大的历史性挑战摆在面前。笔者认为,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趋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经济生活中的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可以相信,国际竞争不断走向强化将是未来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中国能否及时有效地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将会构成未来经

济成长中的最重要的现实制约因素之一。

国际竞争能力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现实生活中看,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贸易大国、投资大国,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是一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现象。近现代的各国的经济繁荣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只有在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才能充分发挥出其活力和效率。国际竞争能力对一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有着直接而广泛的影响。这里的基本原因是国际竞争制约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影响到一国资源配置在分工基础上的使用效率、规模经济效益和制度安排的方式。因此,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强弱之间总是存在相辅相成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封闭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将来也不可能有,封闭自守是无法打破停滞落后格局的。

近代世界经济格局转变的过程表明,新兴的国家往往是从国际竞争能力有显著的改善起步,而走向衰落的国家则往往以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为起点。一个国家无论原先是多么的繁荣昌盛,当其国际竞争能力明显地降低时,就必然面临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奈局面,最多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在国际竞争中的落伍远不只是一个声望问题,而是其资源利用效率和积累能力的实质性下降。而当一个新兴的国家能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时,既是其资源利用效率有显著提高的表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其内部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从而能够有效地增强其

经济发展的潜力,拓展经济成长的空间,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单纯着眼于国内市场取得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是可能的,而要真正实现经济现代化则必须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试图避开国际竞争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已被各国的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不通的。

毋庸讳言,激烈的国际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压力。单纯进行纵向的比较,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也能高度地引以自豪,但是横向的对比表明,这一时期内我们不仅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也比周围邻近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落后了一大截。冷酷的事实促成了政府转变经济发展的战略,也促使公众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引入到国内经济生活中来了,极大地增强了国内经济生活的活力。例如,来自外部的竞争促使了国内企业重视技术进步,改进企业管理,增加资金积累,尤其是在推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再只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更充分体现在同一时期的国际对比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快速前移,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普遍表示出乐观的看法。然而,国际竞争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挑战是国际竞争能力不强。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表现不佳。从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方面来看,我们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相当大,外部竞争的输入已导致了国内不少企业的市场日趋萎缩,被淘汰出局的风险相当高。应当看到,在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国内企业的贡献份额一直是处于下降的趋势中。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合适的立足点。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正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发达国家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我们能否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走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个严峻考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为中国经济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的问题忧虑,存在的权利总是会有,但我们能否较快地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却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国的经济起飞能否较快地到来和能否顺利地

完成。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经济起飞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市场容量持续地扩大,二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积累。而这两者都将有赖于我国国际竞争能力获得实质性的较快提高。

需求导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导向作用包括总量的拉动和结构的诱导两个方面。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以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来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占有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尽管我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的潜力十分庞大,但资源结构并不均衡,只有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才能使国内供给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获得充分的利用。第二,国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构成了对产业结构的一种不利的制约,面向国际市场有利于启动和加速产业结构进步。第三,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很好地促使居民收入较快地上升,推动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现代化。概而言之,国际市场不仅只是一个需求的外部增量问题,也对内部市场的稳定和扩张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如果缺乏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则其内部的市场也将不能得到有效的扩张。

经济起飞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存量增长,更要依赖于我国国际竞争能力的改善。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当有限,粗放型的经营战略是很难持之以恒的。现实生活表明,一个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部门,才是资源利用效率真正高的部门,总体上的国际竞争越强,一国整体上的资源利用效率也就越高。如果我们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国际能力,就能使更多的生产资源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在许多方面都抵挡不住外国商品的竞争,就会导致我们将有限的资源流向进口竞争部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历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国拥有的各种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过多本身不利于经济发展,现代经济生活中生产资源的积累主要在于资金和技术存量的扩张。只有当我们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时,才能使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得到很好的发展,从而有效地促进资本的技术存量的增加,这无疑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二、比较优势是国际竞争能力的深层决定因素

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既可以客观地加以度量,

又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来寻找其内在的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国际竞争能力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是一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因为在当代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首先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商品竞争,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结构是衡量国际竞争能力的基本要素。当然,在国际投资和金融领域等方面的表现,也可以反映出一国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小。但前者无疑是主要的,并对后者有着直接的影响。从现实生活中来看,一国出口竞争能力的问题集中地讲就是比较优势模式的问题,这正是决定国际竞争能力的深层因素。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一词演化出来的。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李嘉图,在解释不同国家为什么和怎样进行商品交换时,提出了著名的比较成本原理。所谓比较成本,是指一国不同产品之间的成本比率,同其他国家相应产品成本比率的比较,亦即成本比率的国际比较。成本比较低即意味着存在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应该也往往总是根据比较成本的高低,而不是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口什么商品,出口什么商品。比较成本的基本思想,也就构成了比较优势原理的核心内容。在国际竞争中,各国能够和应当发挥出来的,是自身具有的相对优势,绝对优势的存在可视作相对优势的特例,也往往只有从相对比较的角度出发,才能使其获得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比较成本论中可以得到的一点基本启示是,各国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而都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增进自身的利益。

各国比较优势的类型是由现实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一国内部所拥有的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是确定其比较优势特有类型的主要因素。通常而言,资本供给充裕的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方面有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往往主要是劳动或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在给定时点上,一国内部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存量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支配着进出口模式的选择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当然,比较优势不是静止不变的。就全球经济而言,在不同时代里占主导地位的比较优势模式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形成和扩大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而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要素的数量积累的相对比例的改变,比较优势的模式也会转换。

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模式不同,可视作各国经

济发展状况的一种国际定位。事实上,比较优势是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并对后者有明显的导向和推动作用。现实的比较优势类型,确定了一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国际竞争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首先,比较优势支配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衡量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有效尺度是国际交换中的获利能力。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各国之所以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根本的原因在于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换,可以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全世界的生产总量,从而让各国分享其利益。在正常的条件下,各国都能够从也应当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但是,现实的生活中,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往往是不均衡、不对称的。有些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明显地提高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而有些国家的公众则只能较少地享受到贸易带来的利益。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虽然国际交换客观上也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但进出口贸易本身却是以自己的多量劳动去交换发达国家的少量劳动,导致贸易条件长期不利甚至出现恶化。这里的关键在于比较优势的模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的进出口模式。应当看到,在给定的时点上,国际市场竞争总会使得某些商品的价格相对有利,另一些商品的价格相对不利,比较优势决定不同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能否获利和获利多少。

其次,比较优势决定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反映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敏感标志是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相对位置。当今世界上,一种无所不包的国际分工体系早已形成,然而,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常常能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刺激。有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有的却明显地处在从属的位置上,这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国民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里,比较优势模式又是影响一国如何参加国际分工的关键因素。从宏观上看,一国内在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确定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互分工,进而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公民在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的相互关系。例如,当今国际上资本的跨国流动十分活跃,但就合资企业的经营过程来看,往往是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一方,对经营管理的决策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提供简单生产要素的一方则往往处于被管理的对象,很难在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利益分配中起到主动的作用。

再次,比较优势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对比。判断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不同国家经济水平的横向比较。这是因为国际竞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如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等等方面的比较。必须看到,比较优势在影响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时,也就对国内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等等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当出口产业同一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主导产业相吻合时,就能有效地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通过产业关联机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加速经济增长。而落后的比较优势模式则往往会因参与国际分工造成结构滞后,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比较优势模式远不只是涉及到国际贸易与分工,而是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比较优势的模式滞后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种严重挑战,它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短期地看,静态地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总是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激烈的国际竞争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强化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滞后的格局。然而,发展中国家既无法完全摆脱国际竞争,又不得不从国际竞争中寻找出路。从长远看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既是有利可图的,也是改变落后面貌的唯一明智的选择。实际上,只要发展中国家能有效地改变自身的比较优势模式,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际竞争的格局。

应当看到,比较优势模式本身是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变自身的比较优势方面存在后发优势。国际市场的存在,为发展中国家将资源或劳动力多的优势转化为资金积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可以加快自身物质资本的形成过程,并相对地节约投资的成本。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既在一定时点上增加了后进国家的资本存量,也能对资本积累起到启动和推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和广泛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跳越技术发展的某些传统阶段,较快地形成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中国家还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制度创新,加快比较优势的转变。这些都有利于后进国家较快地改善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积极启动和推进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

总体上看,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模式是相当落后的。这具体表现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往往是主要“提供”和利用的便宜劳动力,或者是某些相对丰裕一点的自然资源,大体上是处在垂直型国际分工关系中的底部。以出口贸易为例,我国虽然完成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到工业制成品为主的结构转换,但在工业产品的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我们出口的纺织品和机电产品,绝大部分属于成熟期产品,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工资水平低,真正的创新产品是很少的,高科技的创新产品则更少。因此,我们未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出口增长有时是以国民在消费福利方面作出牺牲为条件的,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产业结构进步的带动作用不很明显。改变落后的比较优势模式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

我国已经具备实现比较优势转变的良好条件。从要素积累趋势所引起的国内资源禀赋(这里是指广义的生产资源)状况变动来看,正在朝着有利于比较优势转变的方向较快地发展。在发展中国家行列里,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首屈一指,某些方面还能与发达国家媲美,科技队伍庞大,国民教育基础较好,并已经形成了相当发达的工业基础,完全有条件让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获得更加有效的利用,直至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庞大的固定资产规模,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使中国今后在长时间内能保持相当高的积累率,加上对外开放带来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资本稀缺的局面将会较快地出现改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进步,计划生育政策得到成功的实施,人口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换,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不久将显著放慢,低工资的格局不会长期地维持下去。同时,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这给中国比较优势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一方面,阻碍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生活的政治障碍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格局正在出现一些深刻的变化,有利于中国调整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必须积极启动和推进中国比较优势模式的

转换。没有经济生活中的这一深刻转变,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中国经济起飞。笔者认为,要实现我国比较优势转换这一重大目标,基本的途径应当是充分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加速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不顾现实的经济条件,盲目地追求比较优势模式高级化,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然而,如果固守现有的比较优势模式,前景更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在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问题上,我们完全能够找到现实的结合点。

第一,广泛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促进资金加速积累。资金短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难题,也是中国能否实现比较优势转变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现在真正供给充裕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然而只要使用得当,就能够有效地加快资金的积累,启动整个要素禀赋状况的转变。一方面,我们要利用现阶段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的出口,以创造较充分的就业机会,增加外汇收入,扩大资金积累,同时在国际竞争中逐步提高出口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现阶段上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引进外资的一个有利条件。通过吸收外商投资,短期能增加资本供给,扩大就业;中长期来看,将会促进我国资金积累能力提高,带动技术进步,改善劳动力的素质,是改变要素比例关系的有效途径。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以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这在短期内会扩大我国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然而退一步进两步的明智选择,从长远看是改变比较优势形成基础的必然途径。

第二,加速科技研究产业化,改变生产要素禀赋状况。科学技术要在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之后,才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中国科技研究与生产脱节的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的解决。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按技术能力、科技人员数量等指标将各国的综合科学技术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则美、日、欧共体等属于第一级,中国可列为第二级,亚洲“四小龙”等属于第三级,其他发展中国家属于第四级。但若按产品质量、出口创汇等指标来考察各国的产品竞争能力,则美、日、欧共体为第一级,亚洲“四小龙”等为第二级,中国要列为第三级甚至第四级。可见,差距和潜力都是相当明显的。今后一个时期首要

的任务是推动加速科学技术研究产业化的进程,运用市场机制使科学技术研究尽早变成物质生产力,使已有的技术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以极大地提高技术要素存量比例,这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转变的关键步骤之一。

第三,推动企业制度创新,重塑微观经济基础。广义的要素禀赋虽然从宏观上决定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比较优势,但现实的比较优势要由企业来创造和体现。尤其是在比较优势的转换方面,富有活力的企业制度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企业是承担资本和技术存量积累增加的主体,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宏观资源禀赋状况的约束,创造自身的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要靠企业来发挥,新的比较优势更有赖企业来创造。因此,企业制度创新既是搞活国内经济的要求,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从本质上讲两者是一致的。这里,首先要形成明确的利益约束机制,使企业内在地重视扩大资金积累,追求技术进步,当企业普遍能做到这两条时,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就有保障。其次,要形成产权重组的机制,促使企业走规模经营的道路,提高资源利用率。再次,要让企业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一方面,外贸企业要转向实业化;另一方面,生产企业经营进出口要大大加鼓励,以密切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系,真正形成开放型的经济运行体系。

第四,改善政府宏观管理,强化转换的条件和动力。在国内经济生活方面,政府的干预需要进一步减少和优化。当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调节作用,诱导企业根据现有的要素禀赋来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充分利用供给充裕的生产要素,加速短缺要素的积累时,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这里,政府既要直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也要通过政策来诱导各方面重视人力投资。可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比较优势转换的社会基础。在涉外经济方面,政府的功能则要大大加强。政府必须承担起诱导经济结构调整,扶植出口产业和海外投资的责任。这方面需要有一整套的政策措施,如强化进出口银行的功能,保持汇率的真实性和相对稳定,以及在必要场合实行贸易保护等等。中国比较优势转换的起步早晚和进程快慢,很大程度上将要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

(责任编辑 杨宗传)